



世纪前沿

[美] 埃里克·沃尔夫 著

Eric R. Wolf

赵丙祥 刘传珠 杨玉静 译

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

[美] 埃里克·沃尔夫著 赵丙祥 刘传珠 杨玉静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美)沃尔夫(Wolf, E. R.)

著; 赵丙祥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书名原文: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ISBN 7-208-06254-4

I. 欧... II. ①沃... ②赵... III. 文化史—研究—
欧洲—中世纪 IV. K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6108 号

出 品 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姚映然

装帧设计 陆智昌

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

[美] 埃里克·沃尔夫 著

赵丙祥 刘传珠 杨玉静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 张 36

插 页 4

字 数 440,000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6254-4/K·1213

定 价 46.00 元

目录

前言/1

第一部分 联系/5

第 1 章 导论/7

第 2 章 1400 年的世界/33

第 3 章 生产方式/88

第 4 章 欧洲，扩张的序幕/121

第二部分 寻找财富/151

第 5 章 美洲的伊比利亚人/155

第 6 章 皮货贸易/187

第 7 章 奴隶贸易/232

第 8 章 在东方的贸易与征服/275

第三部分 资本主义/311

第 9 章 工业革命/314

第 10 章 资本主义的危机与分化/348

第 11 章 商品的流通/365

第 12 章 新劳工/415

余论/450

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

文献注释/458

参考文献/503

专有名词对照/549

前 言

在 1968 年，我曾这样写道，人类学要发现历史，这种历史能够解释现代世界的社会体系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这就要求我们以分析的眼光来理解所有的社会，包括我们自己的社会。我认为，我们需要这样一种分析的历史来抵制形式理性在人文科学中的势头，这种理性不再探求人类行动的动因，而只满足于以技术方式寻求解决问题的技术方案。我们使用的方法越来越复杂，而获得的结果却越来越流于平庸。我认为，为了防止流于琐碎，我们应该从过去中追寻现在的原因。惟其如此，我们方有可能理解那些驱使着所有社会和文化的动力。本书就是基于诸如此类的信念而写成的。

我从一开始就清醒地意识到，这样一种分析的历史是无法从对于单一文化或民族、单一的文化区域甚至一个某一时段的大陆的研究中发展出来的。我们有必要重返一种旧式人类学曾经有过的洞见，并重新获得曾经引导着克鲁伯（Alfred Kroeber）和林顿（Ralph Linton）等人类学家努力建构一种全球性文化史的灵感。我们已经忘了，在他们看来，人类是在相互的关系中而不是孤立地营造他们各自的文化的。

不过，那种旧式人类学很少关注 1492 年以来不同文化相互作用的主要动力——这些动力驱使欧洲迈入了商业扩张和工业资本主义。而这些人类学家试图勾勒的文化关联只有在其政治和经济情境中才能比较清晰。因而，惟有在一种新的、历史取向的政治经济学当中才能重新赢得人类学的洞见。

这样一种再思考必须超越我们用来描述西方历史的惯常手法，必须考虑西方人民和非西方人民是如何共同参与这个世界性进程的。人类

学家考察的大多数群体长期以来就一直卷入由欧洲扩张造成的变迁当中，而且他们对这些变迁同样是贡献甚巨。我们再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只书写一种“胜者为王”的历史，或者只满足于书写被支配族群的屈服史了。社会史学家和历史社会学家已经表明，普通大众虽然确实是历史过程的牺牲品和沉默的证人，但他们同样也是历史过程的积极主体。因此，我们必须发掘“没有历史的人民”的历史——“原始人”、农民、劳工、移民以及被征服的少数民族群的鲜活历史。

从根本上说，本书试图跨越不同人文学科之间的界限，消除西方历史和非西方历史的分野。我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坚信我们现在能够对我们人类的状况作出更好的理解。

本书的构想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的思想重估浪潮中开始的。我于 1973—1974 年间在英国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研究工作，全国人文科学基金会为我提供了高等研究员奖金。在此谨向基金会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从 1974 年春季开始写作本书，直至 1981 年书稿方告杀青。我的一些朋友们带着批评的眼光阅读了初稿。为此，我要感谢 Roderick Aya, Richard Fox, Ashraf Ghani, Shirley Lindenbaum, Rayna Rapp, Roger Sanjek, Jane Schneider, Peter Schneider。Samuel Bowles 和 Sidney Mintz 不憚花费时间与我通信讨论某些观点。在某些方面我并没有遵从他们的意见，当然，文责完全由本人承担。令人遗憾的是，我的朋友 Angel Palerm 尚未读到这部著作就辞世了；我非常怀念他那些富有洞察力的评论。

在资料使用方面，我要感谢 Anne Bailey、Mario Bick、Charles Bishop、Warren DeBoer、Ashraf Ghani、Herbert Gutman、Shirley Hune、Herbert Klein、Carol Kramer、Hermann Rebel、Roger Sabjek、Gerald Sider、Juan Villamarin、Elizabeth Wahl 和 Frederick Wyatt。在图片方面，我得到了下列诸位的建议和帮助：美国印第安博物馆、Heye 基金会的 Anna Roosevelt、James G.E.Smith 和 Donald Werner，美国自然史博物馆的 Robert Carneiro、Barbara Conklin 和 Gordon Ekholm；史密逊研究所的 William Sturte-

vant, 以及 Lambros Comitas、June Finfer、Fred Popper、Lucie Wood Saunders、Bernard B. Shapiro 和 Archibald Singham。Noel L. Diaz 和 Caryl Davis 制作了精美的地图。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谢意。我还要感谢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伦敦政治与经济科学学院、伦敦大学, 感谢它们允许我使用它们的馆藏资料。在我工作期间, 纽约城市大学的休伯特·H 莱曼学院和人类学博士论文研究项目、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和大学中心为我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研究、教学和交流思想的环境。我要对他们提供的机遇表示感谢。

当然, 如果没有我的助手和妻子斯尔弗曼 (Sydel Silverman) 的建议、编辑技巧和不断的鼓励, 以及严厉的人类学批评, 所有这些努力都将是徒劳无功的。“我感激你的恩惠与德能, 让我看到所有这些情景, 而这恩惠与德能又都是来自你的威力与善行。”(《神曲·天堂篇》, 第三十一首) 我要满怀爱意和尊敬将这部著作献给她。

埃里克·R. 沃尔夫

商队离开阿勒颇(西奥多·德·布利的铜版画,1599年。阿斯特、莱诺克斯和狄尔登基金会纽约公共图书馆珍藏书稿部提供)



第一部分
联 系



第 1 章

导 论

本书的中心论题是，人类世界是一个由诸多彼此关联的过程组成的复合体和整体，这就意味着，如果把这个整体分解成彼此不相干的部分，其结局必然是将之重组成虚假的现实。诸如“民族”、“社会”和“文化”等概念只指名部分，其危险在于有可能变名为实。惟有将这些命名理解为一丛丛的关系，并重新放入它们被抽象出来的场景中，我们方有希望避免得出错误的结论，并增加我们共同的理解。

在某种层次上，说我们共居在“一个世界”上，这已是老生常谈了。有生态方面的联系：香港流感，纽约喷嚏；美洲庄稼生瘟，祸及欧洲葡萄。有人口方面的联系：牙买加人移民伦敦；华人拓居新加坡。有经济方面的联系：波斯湾油井关闭，俄亥俄车间歇业；美国收支失衡，导致美元流入法兰克福或横滨的银行账户；意大利人在苏联生产菲亚特汽车；日本人在锡兰（今斯里兰卡）修建水电系统。有政治方面的联系：欧洲战争蔓延全球；美国军队侵入亚洲周边；芬兰维持以、埃边界。

这不仅在当前来说是真实的，在过去也是同样。欧亚大陆的疾病几乎曾经灭绝了美洲和大洋洲的土著人口。梅毒从新大陆传播到旧大陆。欧洲人及其动植物侵入了美洲；美洲的马铃薯、玉蜀黍和树薯传遍旧大陆。大量非洲人被强行运送到新大陆；中国和印度劳工被输送到东南亚和西印度群岛。葡萄牙人在中国沿海的澳门创建了聚居地。荷兰人使用孟加拉劳力修建了巴达维亚。爱尔兰儿童被卖到西印度群

岛充当奴隶。逃亡的非洲奴隶在苏里南山谷中找到了避难所。欧洲人学会了仿造印度棉布和中国瓷器，饮用原产美洲的巧克力，吸食原产美洲的淡巴菰，使用阿拉伯的计算法。

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它们意味着接触与关联、联系与互动。但当我们转向学界试图寻求解释时，大部分学者却都对此视而不见。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家都无一例外地把独立的民族当作基本分析框架。社会学继续把世界分割成彼此独立的社会。连人类学也是如此，虽然人类学曾一度关注文化特质是如何传遍世界的，却也将它的对象划分成彼此分立的个案：每个社会都有自身独特的文化，它们被想像成一个整合的、封闭的系统，与其他同样封闭的系统相对立。

如果社会的和文化的独特性与彼此的分立性是人类的基本特征，我们会期望在所谓的原始人即“没有历史的”人民那里最容易发现这些特征，他们被认为既隔绝于外界，也彼此隔绝。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我们又该如何解释下面这些考古学发现：欧洲货物早在1570年就出现在尼亚加拉边陲地带，而易洛魁人中的一支奥农达加人到1670年除了烟管之外仍几乎没有其他任何本土物品？在大西洋的另一端，大量非洲人口的组织和取向都因奴隶贸易而发生了重大转变。如果欧洲奴隶贩子只是把奴隶从非洲海岸转运到他们的美洲目的地，那么，奴隶贸易的供货方就完全掌握在非洲人手里。用英国重商主义者波斯特尔斯华特（Malachy Postlethwayt）的话来说，这正是“美洲商业和制海权的庞大上层建筑”得以建立起来的“非洲基础”。从西非的塞内加尔到安哥拉，大批人口卷入了这场贸易之中，它迅速蔓延到非洲内陆，波及到那些从未见过任何一个海岸的欧洲奴隶贩子的人。所有关于克鲁人、梵蒂人、阿赞得人、伊乔人、伊博人、刚果人、卢巴人、隆达人、恩格拉人等的记载都把每个群体看作自成一体的“部落”，这不仅误读了非洲的过去，也误读了非洲的现在。不止如此，与易洛魁人和西非的贸易反过来也影响到欧洲本身。在1670年到1760年间，易洛魁人大批量地需要格洛斯特郡斯特劳德谷制造的红染布和蓝布。这也是英国

纺织工人失去自主，沦为雇佣工厂工人的首批地区之一。在美洲贸易和斯特劳德谷工业革命的发生之间有一定关联。反过来说，在短短3年之内（1658—1661年），英国就向黄金海岸供应了至少5500支步枪，这使伯明翰制枪业工人获利匪浅（Jennings, 1977: 99—100; Daaku, 1970: 150—151）。

如果联系是无处不在的，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把动态的、相互关联的现象转化成静态的、没有关联的事物？也许个中的部分原由还在于我们学习我们自身历史的方式。无论在课堂内外，都会有人教导我们说，存在着一个叫做“西方”的实体，我们可以把这个西方想像成一个社会，一个文明，它与其他的社会和文明之间既是独立的，也是对立的。在我们中间，许多人甚至越来越相信，这个西方拥有一部系谱，根据这部系谱的说法，古希腊产生了罗马，罗马产生了基督教的欧洲，基督教的欧洲产生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产生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产生了政治民主制和工业革命。工业又与民主制一道催生了美利坚合众国，而美利坚合众国则体现了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然而，这样一个发展图式却是误导。我们之所以说它是误导，首先是因为，它把历史转变成了一个道德的成功故事，一场时间的接力赛，在这场接力赛中，每个选手都把自由的火炬传递给后来人。历史由此被改造成一个讲述道德如何改善的故事，一个讲述好人如何战胜坏蛋的故事。在通常的情况下，这演变成一个优胜者如何通过胜利来证实自身美德与善行的故事。如果历史是在时间中追求道德目标的结果，那么，就此事实而言，那些追求这一目标的人确实是历史偏爱的主体（actor）。

在第二个意义上，这一图式也是一种误导。如果历史只是一个不断展露道德目标的故事，那么，这部系谱中的每一个环节，竞赛中的每一个选手，都只是一个最终典范的先驱，而不是在其自身特定的时间、地点中展开的社会与文化过程的复合体。然而，比方说，如果我们把古希腊仅仅诠释为一位在蛮荒暗夜中高擎道德火炬的史前自由女神的

话，我们究竟能从它那里学到些什么呢？我们就根本无法理解困扰着希腊城邦的阶级冲突，或者自由民与其奴隶的关系。我们就根本没有理由要问，为什么在波斯国王军队中打仗的希腊人要远远多于在抗击波斯人的希腊联邦军队中打仗的希腊人。我们也不会有兴趣知道，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居住的希腊人（他们因此被称为“大希腊人”[*Magna Graecia*]）要远远多于居住在希腊本土的希腊人。我们也就没有什么理由要问，为什么在外国军队中的希腊商人要多于在他们本土城市军队中的商人。希腊之外的希腊居民、外国军队中的希腊商人，以及希腊家庭中来自色雷斯、佛里吉亚、帕夫拉戈尼亚等地的奴隶，都意味着希腊与希腊人以及希腊以外的非希腊人的关系。但我们的主导图式却不会促使我们去质疑这些关系。

没有什么地方比美国历史教科书更能表明这种制作神话的图式了。在美国教科书中，一曲由诸多对抗力量构成的合成管弦乐被改写成一种永恒精髓的展现过程。从这个角度看来，始终处于变动之中的美国疆界以及美国政权不断卷入国内和国际战争（无论是公然的还是暗中的）的事实，都被下述这种目的论的理解一揽子压缩了，即，北美大陆东海岸的13个殖民地，在不到1个世纪之内，把美国星条旗插遍了太平洋沿岸。然而，这个最终结果本身却不过是诸多矛盾关系相互竞争的结果。殖民地宣布独立了，虽然殖民地的大部分人（欧洲移民、美洲土著人和非洲奴隶）都是保守党的拥护者。新共和国在如何处理奴隶制的问题上几乎栽了大跟头，经过一系列有争议的妥协策略，创立了两个联邦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扩张范围。在新大陆上当然有土地可以夺取，但首先是要从美洲原住民即土著美洲人那里夺取土地，然后把这些土地转化成值得炫耀的地产。杰斐逊廉价购买了路易斯安那这块地盘，但只有到海地奴隶反抗法国奴隶主的革命爆发之后，他们才夺取了法国人原计划作为加勒比海种植业的食物供应地的地区。当他们占领了佛罗里达之后，它也就不再是农奴从南部奴隶制地区逃亡的关口了。墨西哥战争使得南方地区成了农奴制和种棉业的安全地带。西班牙

牙地主们正当美洲通往太平洋之要冲，当他们拿起枪来反抗盎格鲁口音的新来者以自卫的时候，他们就成了“土匪”。因此，在北方和南方——它们一个从欧洲，一个从非洲输入自己的劳动力——之间爆发了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之一。战败的南方曾经一度成了北方赢家的殖民地。后来，两个地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随着东北地区工业影响力的衰落，“阳光地带”一跃上升到优势地位。显而易见，合众国既不是不可分割的，它的疆界也不是神授的。

我们完全可以想到，事情原本可能会完全不同。在这里，本来可能会兴起一个多语种的佛罗里达共和国，一个说法语的密西西比美国，一个说西班牙语的新比斯开国，一个大湖共和国，一个哥伦比亚国——包括着今天的俄勒冈、华盛顿和英属哥伦比亚。只有当我们假设神意授命北美大陆上出现一个地理政治单位时，这种回顾才会显得没有意义。相反，它促使我们去具体地探究每一个结合点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去探究某些关系究竟是怎样压倒其他关系的。这样一来，无论是古希腊、罗马、基督教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甚至美国，都决不是由某种内在的驱动力推向最终目标的，毋宁说，是由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变化着的、也可以变化的一系列关系或众多关系中的某些关系促成的。

这远不是脱离实际的学术教条。由于我们变名为实，我们才创造了虚假的现实模式。由于我们将国家、社会或文化想像成一些有着内在同质性以及外在独立性、封闭性的实体，我们才创造了一个世界的模式，它仿佛是一个全球性的台球厅，在其中，不同的实体彼此撞击着，就像许多坚硬、滚圆的球体一样。因而，我们可以很容易把世界分成涂着不同颜色的台球，然后轻易地说：“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它们永不谋面。”以这种方式看来，西方和东方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在东方，生命是如此地卑贱，卑屈的子民们遭受着各种专制主义的压迫。后来，当其他地区的人民纷纷宣布在政治、经济上独立于西方和东方时，我们又称这些新的历史地位的申请人是欠发达的第三世界（这

岂不仍然是我们所想像的台球的残余分类吗），与它们相对的，是发达的西方和发展中的东方。也许不可避免的是，这些具体的分类充当了从知识上进行冷战迫害的工具。有一个西方的“现代”世界。有一个东方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已经沦为共产主义的牺牲品，是“阻碍现代化的痼疾”（Rostow, 1960）。最后，还有一个第三世界，它依然遭受着“传统”的束缚而不能自拔，正举步维艰地迈向现代化之路。如果西方能够找到办法破除那种症结，或许它就能够把那些牺牲品从在东方产生并传播的传染病中拯救出来，并把第三世界送往现代化的康庄大道——送往西方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康庄大道。这种思考世界的方式导致的最可怕后果就是“强制都市化”（Huntington, 1968: 655），它认为，只要用飞机大炮炸毁乡村，把越南人赶进城市，就可以强迫他们走向现代化。因而，名变为实了，凡是还贴着“未可知”之名的事物，都足以成为战争的靶子。

社会科学的兴起

把那些被命名的实体诸如易洛魁、希腊、波斯或美国等作为因稳定的内部构造和外部界限而彼此对立的固定实体来处理的习惯，妨碍了我们理解它们彼此的接触和遭遇。事实上，这种倾向使我们难以理解所有这些接触和遭遇。用想像的积木垒成所谓“东方”和“西方”或“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之类的金字塔，这只不过使得那一困难变得更加复杂了。因而，实际上在我们看待社会现象和政治现象的方式中，我们遇到了某些概念的欠缺，而不是暂时的偏离。我们似乎在过去的某个关键点上转错了理解方向，这种错误的选择极大地危害了我们目前的思考。

那个关键的转折点是可以确定的。它发生在上个世纪中期，在那时，对自然和不同人类的研究分裂成了独立的（和不平等的）专业与学